



女性主义批评的构建策略及启示

——基于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简·爱》的分析

杨丽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从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入手,主张采用修正父权诗学的方式重新解读传统文学中被遮蔽的女性作品,并使用女性经验和视角审视、发掘隐藏在作品中的女性文化经验,归纳总结女性作品的共通性和相似性,以此构建女性主义批评诗学的理论框架体系。两位批评家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对《简·爱》分析时采用的策略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是分析19世纪其他女性作品常用的方法。归纳梳理批评家分析《简·爱》所使用的策略和方法,有助于正确认识女性主义批评诗学的理论内涵,对我国女性主义批评建构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建构;《简·爱》;策略方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2-0060-05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爆发了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女权运动,以聚焦女性社会地位权利和批判男权制度下的女性压迫为主要特征,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平等,运动对表现在文学维度上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产生了影响。文学批评领域以英美派伊莱恩·肖沃尔特为代表,她们主张使用全新的女性经验和视角审视传统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发掘过去被淹没的女性创作资料,揭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两性对立关系和女性被压迫的真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女性文学经典传统,进而构建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体系,解构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文学传统。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合著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1],该书从1979年出版以来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两位批评家在书中采用修正父权诗学的方式,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重新审视西方文学史,深度挖掘被历史和男性文学埋没、遗忘及边缘化的女性文学。她们选取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作品并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进行再阐释,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女性作品

的相同文化经验和写作策略,归纳总结女性主义批评的共同规律,重新建立女性价值观念体系和批评标准,以期“对长期以来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1]序4},建构女性主义批评诗学。

两位批评家以19世纪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玛丽·雪莱、乔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这与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创作视角立场、批评标准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这一时期英美女性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写作不再采取匿名方式隐藏自己的性别。另外,女性作家创作时受到了相同社会背景、经验、文化的影响,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影响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在形式、主题、内涵、风格上不同于男性文学传统。“19世纪的文学女性确实既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也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化——换句话说,到了19世纪,一个丰富的、获得清晰界定的女性文学亚文化业已形成。”^{[1]序3}可见,批评家在书中使用的策略方法与肖沃尔特从女性主体身份价值观出发打破地域、时空、民族界限的批评策略主张和手法相似,女性主义批评内部具有稳定的理论结构 and 价值体系。本文基于《阁楼上的疯女

收稿日期:2022-10-22

作者简介:杨丽娜,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对《简·爱》的分析,归纳梳理批评家建构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策略,以期对我国女性文学有一定的启示。

一、叙述话语视角的错位:混淆愤怒情绪的发泄主体

语言作为政治经济权利的表征具有塑造话语权的功能,女性主义批评用话语叙述策略改变男性歪曲女性的真实存在,进而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男性话语统治秩序,冲破父权制思想体系塑造女性主体的功能,颠覆既定的男性话语世界,避免陷入男性话语统治的逻辑思维之中。“文学作品是表现社会和传播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最有力的工具,父权社会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最具有宣传性的。”^{[2]35}文学语言表意符号结构之下隐藏着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叙述者一旦进入话语体系之中并使用这套话语,就不能摆脱话语对叙述者的影响。由于女性从被看转向看、从被写转向写,容易使叙述话语视角出现错位,批评家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思维方式,批判否定男权制统治结构及主导话语下的女性压迫,对语言规则、叙事结构及隐含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从话语叙述层面对话语表述本身进行分析,分析作品时往往会把作者的愤怒等同于作品中人物的愤怒。吉尔伯特对《简·爱》的分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写小说这种方式表现了作家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吉尔伯特在分析中混淆了勃朗特和简的身份,如开篇:“年轻的小说家这回似乎毅然决然地睁开了眼睛,对她周围的以及通过自身体现出来的女性现实进行审视:这些现实包括受禁闭的状态、孤儿身份、饥饿、愤怒乃至疯狂。”^{[1]431}吉尔伯特把勃朗特和简视为同一个人,把《简·爱》当作勃朗特的自传。产生以上现象的原因与小说的写作风格也有一定的关系,该小说从出版问世以来一直是评论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其思想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很多评论家在分析作品时也把它当成勃朗特的自传,原因有四。其一,小说中有大量描写愤怒情感的句式和语句,勃朗特喜欢用排比和反问句式描写人物情绪,如小说开头在叙述简的童年生活时用了大量排比句式:“我为什么老吃苦头,老被呵斥,老受责难,老是有错呢?为什么我总是不得人喜欢?”^{[3]11}“那个凄惨的下午,我的心灵是多么惶惑不安啊!我是多么满脑子乱作一片,又满心愤愤不平啊!”^{[3]11}再如小说中常用“小暴君”“发了疯的猫”“恶毒的小精灵”“喷火的妖精”等一系列语句和句式形容简,这为小

说营造了愤怒的情感基调,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简的愤怒情绪当成作者的情绪。其二,小说中经常出现“读者”“读者啊”一类的词语,这类词语往往给读者营造一种倾听故事的氛围,作者似乎在向读者讲述她个人的遭遇。其三,小说采用具有内心独白特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情感基调像是主人公娓娓道来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故事。其四,《简·爱》是一部女性追求男女平等、思想独立的宣言之书,勃朗特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思想与简十分相似,同时批评家在《句子的影响力量:女性作家与作者身份的焦虑》中也提到了这一观点:“夏洛蒂·勃朗特其实是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在描绘着自己被剥夺、被限制的生活,以及她所处的真实处境。”^{[1]111}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勃朗特作品中,而且还出现在19世纪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在当时的文坛中具有普遍性,“女性作家笔下的文学现实折射出的,却是她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束缚,她们在开始进行写作时,拥有相同的或自觉或无意识的目的”^{[1]111}。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简·爱》进行分析和评价时也认为勃朗特确实借写小说的方式宣泄了自己的愤怒情绪,反抗父权社会意识霸权,“她虽然应该平心静气地写,然而她不能,她一边写一边发怒,她应该写小说里的人物,可是她写的是她自己,她和她的命运的挣扎”^{[4]98}。伍尔夫反对勃朗特违背小说应描写客观社会现实的原则、进而使小说失真的写作方式。吉尔伯特在分析《简·爱》时并不考虑小说的忠实性和客观性,她相信自己女性主义分析的正确性建立在对文本的合理性解读和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合理建构上,正如批评家在序言中所阐述:“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而要相信女性主义的分析。”^{[1]13}

二、人物形象的再阐释:重新解读被遮蔽的女性形象

吉尔伯特和古芭主张以性别意识为核心对女性写作和文学史进行重新梳理,以此构建女性文学框架,解构男权话语和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模式,挖掘由男性建构的文学史中对女性形象的忽视、遮蔽和歪曲。批评家在建构女性诗学过程中试图通过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女性需要改变在社会和文学中虚弱无力的形象,以女性独特视角建立新的女性文学形象,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世界,避免读者受到男性话语权的利用和控制。文学史中以男性为主流的文学作品存在大量性别歧视,由于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有限,女性的

真实经历和感受不能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真实表达。另外男性对女性的研究也使女性形象成为男性心目中应当有的样子,即使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多数受到男性中心主义诗学的影响,西方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模式下建构出来的,男性作家和批评家在西方文学中一直是文坛主角,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则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西方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男性构建起来的并体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这些都建立在以父权统治为中心的社会话语结构之上。批评家从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重新阐释中构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批评,打破了文坛被男性话语垄断的局面,她们在构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使用的另一策略是通过对传统女性文本的挖掘,对小说中的反传统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解读。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按照男性意愿被塑造出来,女性形象塑造的价值偏向以男性为中心,并打上了男性统治者的烙印,她们具有高尚的品德、温良恭顺的性格、美丽大方的外表,循规蹈矩、缺乏个性、千篇一律,“这些文学女性不仅被拘禁在男性占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当中,还无可避免地陷落于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称之为‘父权诗学’的特殊的文学建构之中”^{[1]序2}。女性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现实生活中她们地位极其低下,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以为比男人还伟大,但这都是小说戏剧中虚构出的女人。实际上,却如特里威廉教授所说的,她被关起来,被鞭打,被人在屋里推得东跌西撞”^{[4]20}。批评家在现实生活中也遭受了因女性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也是促使她们对女性身份、地位、话语结构进行反思的原因之一。她们认为19世纪的女性作家为了反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迫,往往会在作品中塑造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疯女人并不仅仅是女主人公的对手或阻挠与干预她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通常更有可能是作者的重影或替身(double),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焦虑和愤怒的形象”^{[1]100}。这些女性不守妇道,不遵守常规戒律,她们以反常规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类型人物以《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为代表。简身上敢于追求自由平等婚姻的反叛精神和女性自我觉醒意识一直是人们解读小说中女性主义的聚焦点。吉尔伯特认为勃朗特通过塑造伯莎这一形象表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并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伯莎形象进行了详细解读:

“伯莎是简最真实和最黑暗的重影:她代表了孤女简的愤怒,代表了简自从在盖茨黑德生活以来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1]460} 吉尔伯特对“疯女人”是简最真实而隐秘自我形象的分析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伯莎作为替身做了简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每一个“疯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压制的自我,这个自我既是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也是小说中反抗男性父权、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主人公。批评家在书中其他章节分析作品时也常用以上方法,这也是为什么选用“阁楼上的疯女人”为书命名的原因:“夏洛蒂·勃朗特这位常常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的19世纪小说家确实我们的研究当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通过对她的小说作品的细致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呈现出一条新的路径,通过这条路径,我们得以对19世纪的所有女性作品进行阐释。”^{[1]序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批评家受到《简·爱》启发并且认为她们对这一小说的分析具有典型性、示范性和普遍性,“疯女人”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19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品中,这种分析方法是批评家分析19世纪其他女性作家作品的常用方法。

三、父权意识和秩序的解构:挖掘深层结构模式下的隐喻意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了对经典权威的反省,通过采用女性意识的立场视角对作品仔细阅读分析,总结出女性文学的共通性和相似性,挖掘隐藏在女性作品中普遍存在的被男性话语和视角遮蔽的写作手法模式,话语表达方式从审美意义过渡到审视两性关系进而抗争性别话语谱系,反抗以男性权力为中心的性别意识。“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也存在于思维与日常行为之中……语言与思维是隐喻中互为表里的二维。”^{[5]777} 女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使用的表现手法和叙述风格有清晰的内在发展特征和规律,彼此之间潜藏相互依存意识和内在化的女性心理构造。批评家借鉴后结构主义方法对父权意识形态和秩序结构进行解构,颠覆了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通过使用大量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阐释作品中的隐喻结构,消解理论话语中的父权逻辑,如对“逃跑—监禁”“冰—火”“天使—魔鬼”“简·爱—海·伦”“罗切斯特—圣·约翰”等的分析,二元对立结构模式背后暗含着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批评家分析《简·爱》开端“逃跑—监禁”这一对立结构时认为,童年时的简被关在红房子里是因为红房子是象征父权结构

统治大厦的隐喻,是充斥父权气息的死亡之屋,简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逃离红房子暗示着她想通过疯狂的逃跑摆脱父权制的掌控。逃跑与监禁主题在19世纪其他女性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代表了父权社会中每一位女性都一定会遭遇并加以逃离的困境。

另外,批评家运用了神话原型模式对小说中的叙事线索进行分析,认为勃朗特在创作小说时借用了约翰·班扬描写男性《天路历程》的神话式探险结构,采用戏拟方式对《天路历程》进行了重新定义和修正,通过重新界定女性本质主义来建构女性话语场。这种方法具有革命性,可以解构男性相对稳定的规范性和话语操纵行为,隐喻了以朝圣之旅为题材的作品不再是男性的专属,女性同样可以成为这类题材中的主人公,同时又通过话语操纵巩固其地位。小说开头那句“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暗示了简“为了获得成熟而必须解决的种种困难”。另外,简的人生旅程也具有神话式的演进特征,整部小说始终贯穿着一条由不平等到平等,再到不平等,最后达到平等的发展线索,也是简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胜利史。小说开始部分简作为家庭教师与罗切斯特地位悬殊,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后来,简与罗切斯特相爱,说出了内心最著名的一段话:“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个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是如此。”^{[3]273}这段话宣告了简与罗切斯特抛开外貌、财富、社会地位,达到了灵魂的平等。后来,伯莎的出现使简在道德和地位上对罗切斯特产生了不信任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最后,伯莎在火灾中死亡,罗切斯特被烧伤,简继承了叔叔的五千镑遗产,这些条件使他们又回到了平等的位置上,此时在简的眼里她与罗切斯特之间达到了一种完全的平等。批评家认为勃朗特是在小说中隐晦地告诫人们,两人只有达到完全平等才能顺理成章地结婚,幸福地生活。小说结尾以主人公与丈夫在芬丁庄园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结束:“如今我结婚已经十年。我全心全意地跟我世上最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我自觉无比幸福——幸福到言语都无法加以形容,我们的性情正好相投——完全和谐是当然的事。”^{[3]500}同时简身边的人也都很幸福地生活在和谐快乐的人间乐园里,“我的爱德华和我都很幸福,尤其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最亲爱的那些人也同样幸福”^{[3]501}。至此,简的“朝圣之旅”也圆满结束,其终点不是班扬《天路历程》中的天国之城,而是现实社会中充满烟火气息的尘世生活,在这里人们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这种童话般的理想结局在小说出

版后被认为是“无法无天”的,它违反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生活所限定的规范。勃朗特似乎在用这样的结局告诫人们:“这桩由真实的心灵在芬丁结合而成的婚姻才是应该的。尽管她的道路可能障碍重重而又充满了孤独,至少它代表着希望。”^{[1]473}这座人间乐园里的生活暗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期望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虽然很难实现,但却激励着人们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四、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和意义

吉尔伯特和古芭构建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策略是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位批评家通过梳理文学史中女性作品的共有模式和历史发展脉络,创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批评诗学,从分析其使用的策略中可以反思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局限性,总结女性主义批评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创作中要对身体写作概念及理论进行正确的定位

中国女性主义创作中存在以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理论为女性写作路径的模式,女性作家主体基于女性特有心理的共同体验寻求新的语言叙述表达,通过写作在作品中努力建构自身主体性,摒弃迎合适应男性传统的创作轨迹,将女性创作视为有独特价值和自身特色的系统。商业语境下这种写作被窄化成私人化、粗俗低质的“身体写作”,作家把封闭、压抑和不被承认的女性经验作为文本主要内容,突出女性天生的自然性别特征,用写作的方式深化身份认同,以独特的身体语言书写身体欲望,将自身嵌入文学史中,彰显身体差异并弱化人的社会性情感,认为“写作可以用作反叛思想之跳板,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6]192}。这种“身体写作”使女性身体在自我消解和疏离中变成无本质之物,“‘身体写作’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眼里是对女性立场的表达,远不局限于对女性生理性感受的描述,更不是局限于女性的特定身体器官的感受”^[7]。我国女性创作要避免陷入“身体写作”概念的理论误区,要通过社会现象从肤浅的女性观念中解放出来,挖掘女性在现实生活处境中的真实情感和个体心理意识,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在创作实践中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性别研究路径。

(二) 避免陷入确立性别范畴的误区和困境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要避免陷入不可调和的两性二元对立矛盾中。建立独立且不依附其他理论的女性主义批评不可能存在,任何学科仅有一种性别研

究为支撑是不健全的,男性和女性在文学研究中既不是旁观者、局外人,也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参与者。因此,批评中强调单一性别侧面是对性别范畴的歪曲和扁平化,过多简化地对男女两性文本进行讨伐批判具有局限性,一些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关注思考和书写阐释在深广度上超越了部分女性,因此体现女性社会关怀的女性创作和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书写应该受到同等对待。女性批评有依靠男性写作模式的理论成分,并未完全摆脱男性文学的影子,过分强调性别差异、矛盾进而确立具有排他性的单面化性别范畴是不可取的。性别歧视会制约女性批评,批评方法没有性别之分,性别关系视阈应该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既要性别人手又要跨越性别,注重两性关系及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和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创作的文学才是完整的。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观也主张消除男女性别对立,强调人的全面整合发展。我们要承认性别差异并和其他批评模式相兼容,激发男女两性身上各自的优秀特质,避免陷入女性占据上风、男性又反过来解构女性的批评循环中,打破性别等级秩序单一化倾向,使两性冲突走向双性和谐,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性别理论丰富、多元,形成包容男女作家的跨性别社会共同体。

(三) 途径及方法上拓宽思维路径和研究视域

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建构中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过程中过多关注文本的主题、人物、思想内容,而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研究探索相对较少,文学作为叙事话语其内在审美构成机制是其本质特征不可缺少的一面。文学批评流派的形成受多种因素操纵影响,女性文学理论体系不可能与男性社会话语完全割裂,我们应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重视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和批评策略,构建女性诗学过程中要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客观地考察两性社会文化关系,营造多元的理论生成空间来对女性身份和写作传统进行阐释,将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学科结合建立跨领域的研究范式,使理论实践从单纯文本表象解读走向深层内涵挖掘,多侧面、多层次从社会语境中揭示性别文化基础和

现实依据。批评家应多深入社会与各阶层保持沟通、交流与对话,在发展中确立中国形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特质,注重女性文学书写的主体地位,创作有影响的经典文本,从女性文本创作经验中总结提炼新的理论观点拓展理论深广度,从宏观视域和多样化的观察视角对批评理论及方法进行反思批判。另外,中西方社会进程、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取向不同,要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理论的有益成果,走出盲目照搬套用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误区,立足本土结合其他学科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理论建构,对自身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进行调整,摆脱依赖国外理论的困境。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应与中国语境融合以适应当代文学发展需求,结合本土现实情况充分挖掘中国女性文学特有的审美内涵,强化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与兼容性;关注时代语境大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处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境域中的女性意识,参与性别主体建构的实践考察,发现被掩藏的中国特质;基于民族文化与社会现实情况进行理论创新,营造多元化理论观点的生成空间,建设中国形态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体系,开拓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状的女性主义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吉尔伯特, 古芭. 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 19 世纪文学想象[M]. 杨莉馨,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2] 米利特. 性政治[M]. 宋文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3] 勃朗特. 简·爱[M]. 吴钧燮,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 [4] 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还,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5]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6] 西苏. 美杜莎的笑声[M] //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7] 周珉佳. 身体美学与身体写作: 本土化、异化与延展泛化的文化肌理[J]. 学习与探索, 2021(11): 161-167.

[责任编辑 亦 筱]